

花 與 果

王 介 平 著



王介平
畫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花

王介平著

與

果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發行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者 王介平

發行人 顧樹森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花與果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追念劉士志先生

李劫人

「花與果」代序

——即今日之所謂校長——劉士志先生。

於今將近四十年了，然而每每和幾位中學老同學相聚處時，還不免要追念到當時的監督

——至今我記憶猶新的，還是和劉先生初次見面的那一幕。時為光緒三十四年，我剛由華陽中學戊班，為了一個同班學生受欺侮，不惜大罵了丁班一個姓盛的學生一頓，而受了監督陸繹之，教務馮劍平不公道的降學處分，——即是將我由華陽中學降到華陽小學去——我憤然自行退學出來，到暑假中去投考四川高等學堂附屬中學的丁班時，因了報名的太多，試場容不下，劉先生乃不能不在考試之前作為一度甄別的面試，分批接見的那一幕。

劉先生是時不過三十多歲，個兒很矮小，看上去絕不會比我高大。身上一件黃葛布長衫，袖口不算太小，衣領也不太高，以當時的款式而論，不算老，也不算新。腦瓜子是圓的，臉蛋子也近乎圓，只下頰微尖。薄薄的嘴唇上有十幾二十莖看不十分清楚的蝦米鬚，眉骨突起，眉毛也并不濃密。腦頂上的頭髮，已漸漸在脫落。光看穿着和樣子，那就不如華陽中學的監督與教務遠矣；他們不但衣履華貴，而且氣派也十足。劉先生，只能算一位剛剛進城的鄉學究罷了！不過在第二瞥上，你就懂得劉先生之所以異乎凡衆的地方，端在他那一雙清明，正直，以及嚴而不厲，威而不猛的眼光上。

其時，劉先生坐在一張鋪有白布的長棹的橫頭，被接見的學生，一批一批的分坐兩邊。各人面前一張自己填寫好的履歷單子。劉先生依次取過履歷單，先將他那逼人的眼光，把你注意一陣然後或多或少問你幾句話。要你投考哩，履歷單子便收下，不哩，便退還你。有好些因為年齡大了點，被甄別掉了。有一位，好像是來見官府的鄉紳，漂亮的春羅長衫，漂亮的鐵線紗馬褂不計外，捏在手上的還有一副剛卸下的墨晶眼鏡，還有一柄時興的朝扇，鬆三把搭絲絛的髮辮，不但梳得溜光，而且腦頂上還蓄有寸半長一道筆伸的流海。劉先生甚至連履歷片都不取閱，便和藹的向他笑說：『老哥儘可去投考紳班法政學堂』。

這鄉紳倒認真的說『那面，我沒有熟人。』

『我兄弟可以當介紹人的。』

就這樣在初試時，還是佔了四個講堂。到覆試結果，丁班正取四十名，備取六名。就中年紀最大的，恐怕要數我了，是十七歲。其次如魏崇元（乾初）雖與我同歲，但月份較小。在榜上考取第一名，入學即提昇到丙班第二學期又昇到乙班的李言蹊，或許比我大點。而頂年輕的如魏嗣鑾（時珍），謝盛欽，劉茂華，白敦庸，黃炳奎，（幼甫，此人有數學天才，可惜早死。綽號就叫老弟。）楊蔭堃（樾林）等，則為十三歲。周焯（朗軒，民國元年後改名無改字太玄而以字行，）雖然塊頭大些，其實也只十三歲。如以籍貫言，倒是近水樓台的華陽縣籍，只有兩個人，我之外，第二個為胡嘉銓（選之）；成都縣籍僅一個人雍克元。

四川高等學堂附屬中學，是光緒三十三年秋季開辦的，第一任監督為徐子休，（後來通稱徐休老，又稱霽園先生，）招考的甲乙兩班學生，大抵以成都華陽兩縣籍居多，而大抵又

以當時一般名士紳以及游宦世族的子弟爲不少；個個聰明華貴，風致翩翩。丙班學生是光緒三十四年春季招考的，劉先生已經當了監督，如以丁班學生爲例，可以知道丙班學生也大抵外州縣人居多，也大抵山野氣要重些。劉先生對於甲乙班學生的看法，起初的確不免懷有一種偏見——雖然他的兒子也在乙班肄業，總認爲城市子弟難免近乎浮囂，近乎油滑，所以每訓誡丙丁班學生，一開頭必曰：『諸君來自田間……』

劉先生對待學生的態度，在高等學堂那方面，大概也無二致，就我們這方面言，的確是光明，公正，熱忱，謹嚴。學生有一善可紀，一長足稱，總是隨時掛在口上。大概頂喜歡的還是踏實而拙於言詞的學生。至今我們猶然記得劉先生常常嗟歎說：『丙班之蕭雲，丁班之胡助（少襄，是時也才十三歲，）吾深佩服！……』（胡助後在陸繹之代理監督時，不知爲了一件甚麼小事，因要拿幾個學生來示威，遂沒緣沒故的同別的五個學生，一齊被懸牌斥退。大家都知道胡助是着了冤枉的好人，陸繹之之所以未能蟬聯下去，大概於這件錯誤的處分上，也略有關係，因爲學生們太不服了。）但是一般桀敖不馴，動輒犯規的學生，劉先生也一樣的喜歡，這裏，我且舉幾個例。

先說我自己。我是爲劉先生認爲浮囂，油滑的城市子弟之一，而且又知道我是一個不大安分，曾被華陽中學處分過的學生，（大概是陸繹之告知的。那時，陸正任丁班的經學教習——教左傳，雖然是尋行數墨的教法，但對於今古地域的印證，却有見地。——於頭一次上講堂時，就望見了我，並立刻走到我的座位前，察看我的名字。我曾大不恭敬的回說：『還是這個名字，並沒有改。』而且後來在斥退胡助的那事件時，他到丙班講堂訓話，頭一名就

點着我大言曰：『這一回可沒有你在罷？』後來，尙起過兩度糾紛，不在題內，可不必博引它了。〕平常到夜間巡視自習室，在我書案前勾留的時間，比較多些，問這樣，問那樣，還要翻翻抄本，查詢一下所看的書，整一學期，都如此。大概後來看見我被記的小過多了，從記過的行爲上，看出了我並不怎麼壞罷，方對我好起了好感。直到有一次，因我和張新治（春如）開頑笑，互相發散四六文傳單，彼此譏罵。而我用的是自己發明的複寫紙，發得多些，因才被監學無意間查獲了兩張！正遇劉先生照例在空塢上公開教訓學生時，立即告發前去。於是把洪垂庸（秉忠）和人罵架的案子一結，立刻就點到李家祥這一案。

李家祥的過失太大，當然從頭教訓到脚，從小演說到大，其後論到本題：『看語氣，自然是在對罵。那嗎，張新治也不對，張新治呢？站過來？』

張新治站過來了。一件藍洋布長衫滿是油漬墨漬，而且從腰到衩三個鈕扣，都宣告脫離。劉先生於是話頭一轉，從衣冠不整，則學不固，一直發揮到名士乃無用之物。然後才徐徐問到正案，張新治是絕口否認他也發過傳單。取證到我時，且故意說：『兩個人共犯，處分要輕些的。』但我却決意不牽引張新治在內，並且慨乎其言的頂回去道：『都是我一個人做的。我不要人分過。請你處分我一個人好了。』

劉先生微笑了笑：『那沒別的說頭，記兩大過。』

教務在旁邊說：『李家祥，我記得已記了十一個小過，倘再記一大過，就應該斥退的。』劉先生不假思索的道：『那嗎，暫時記一大過五小過再說。』

大過小過的確記了。但劉先生從此就不再把李家祥當作一個浮囂而油滑的城市子弟。』

其次一件事，在當時實算學堂內政上一件大事，若交任何監督來辦，——自然更不要說陸繹之——當然無二無疑的掛牌斥退。而且風聞其他學堂，的確是照這樣辦法辦的。

事情是兩個年齡小的學生不知利害的犯了一件小孩子處在一處時所難免的不好行爲。不知怎樣，忽然被丙班三個學生義憤填胸的認爲太不道德，太有關風化了；並認劉先生不聲不響的處理爲不當，於是挺身而出，橫着一面無形的正義大旗，攻向監督室裏，要求解決，雖不肆諸市朝，亦應明白逐出學宮，與衆棄之。否則，人慾橫流，國家興亡都似乎有點那個。

無形的正義大旗一舉，不但那兩個將被作爲祭旗的犧牲駭得打抖，便是我們一般並非講仁義說道德的學生，想到劉先生之嫉惡如仇，行端表正之烈火般的脾氣，究不知將因這面旗子的不可抗拒的影響而暴發出來的，是怎樣的一種可怕動作。然而才真正的不然，在星期六的夜晚，經劉先生出乎意外的，心平氣和而且極近情理的一解釋，這旗子似乎就有點飄飄起來。劉先生談話的大意是：小孩子不知道利害的胡塗行爲，應該予以教訓，使其明白這不是好的，並且有損於他們自己。但先要保存他們的恥，然後他們才能革。所以我們只能不動聲色，慢慢指教，而絕不應該大鼓大擂，鬧到人人皆曉，個個皆知。這樣，他們一時的過失，豈不因爲我們的不慎，而成爲終身之玷，而弄到不能在社会上出頭？不但損及他們的家庭聲譽，甚而還可損及他們的子孫，這關係難道還小了嗎？有許多人都是因了一點不要緊的小過，即因被多數的好人火上加油，弄到犯過者雖欲悔改而不能；因就被社會所指責；懦弱的只好終身受氣，強梁的便逼上了梁山。這還說是真正犯了過的。至於某某兩人的過失，尚未如你們所說的之甚，不過行爲之間，有其可疑之點而已。我們從種種方面着想只能好好的

指教之。連掛牌記過都說不上，何能即便指實，從而渲染，將人置於不可復生的死地呢？

這種極近情理的話，已將大多數學生的見解轉移了。但那橫着無形的正義大旗的三位，却還頑強的不肯折服。不過來時是氣勢汹汹的攻勢，去時只能持着一張大盾來作守勢。而這大盾便是人生的道德，學堂的規則與夫學生大眾的輿論。

劉先生本來可以不再理會這三個道學者，但是他一定要說服他們，他不願意隨便利用他當監督的否決權，雖然那時候還沒有德謨克拉西的意得約諾紀，而劉先生又是著名的性情暴躁的正派人，曾經用下流話破口罵過徐子休，同時還拿茶碗擲過他。因此到次日星期日的夜間，衆學生都回到學堂之後，（當時的附屬中學並無走讀制。甲乙兩班學生，合住在本學堂，丙丁兩班則住在隔一朵牆和隔一箇穿堂的高等學堂。——即從前王壬秋當過山長的尊經書院的原址——的北齋。借此我再將我們那時所住的中學生生活，略說一說。那時，我們每學期繳納學費五元，食宿雜費二十元，我們每學年有學堂發給的藍洋布長衫兩件，青毛布對襟小袖馬褂二件，銅鈕扣銅領章——甲乙兩班在前一年發的還是青寧綢作的哩。——漂白洋布單操衣褲兩身，墨青布夾操衣褲一身，長鞦密納幫的皮底青布靴兩雙——甲乙兩班在頭一年還有青絨靴一雙——平頂硬邊草帽一頂，青絨遮陽帽一頂。寢室規定每間住四人至六人，每人有白木乾淨床一間，並無臭蟲虱子，白蔴布蚊帳一頂，有舖床的新稻草和草墊，有舖在草墊上的白布臥單，有新式的白布枕頭。每一寢室有衣櫃一具至二具——別有儲藏室以擱箱籠等。有銀樣的菜油錫燈盞一只，每天由小工打抹乾淨後，上足菜油。每處寢室，有人工自來水盥洗所，冷熱水全備，連臉盆都是學堂供給的。講堂上不用說，每到寒天，照例是有四盆

紅火烈烈的大火盆。自習室到寒天也一樣，不過只有一盆火。自然，每人一張書桌，但是看情形說話，如其你書籍堆得多，要安兩張也可以。每張有銀樣的菜油錫燈盞一只，有一個小工專司收燈，擦燈，放燈，上油。每人每學期有大小字毛筆若干枝，抄本二十五本；用完，還可補領；各科教科書全份，至於中西文書籍，可以開條子到高等學堂的藏書樓去借。一言蔽之，每學期二十元，除食之外——至於食，後面再補敘，——還包括了這些。所以起居服飾，求得了整齊畫一，而又並不每樣都要學生出錢或自備，故無苛擾。亦無有意的但求形式一致，而實際則在排斥貧寒有志的學生。因此，學堂也才辦到全體住堂，而學生並不感覺像住監獄的制度。管理是嚴厲的，早晨依時起床點名，盥漱後不能再入寢室，晚間搖鈴下了自習後，才准魚貫而入寢室。滅燈之後，強迫睡眠。星期日薄暮回堂，遲則記過，也是嚴厲執行着的。記得那位秦稽查，人雖和藹，但是對於學生名牌，却一點也不苟且，也一點不通融。○劉先生又叫小工將三位招呼到教務室，重為開導。這一次，劉先生却說得有點冒火了，大聲武氣的吵了一陣之後，忽然向着三人作了一個大揖道；『敬維顓敬先生，梁元星梁先生，蒙爾遠（文通）蒙先生，三先生者，維持風化之先生也，如其他們家庭責問到學堂，我兄弟實無詞以答，這只好請煩三先生代兄弟辦理好了！……』

這一來，三先生的旗盾才一齊倒下了。兩個可憐蟲並未作犧牲，而三先生也大得劉先生的稱許。

此外還有一件極小的事件，也可看出劉先生的通達，機敏，處理有才。

劉先生性情直率，喜怒愛惡，差不多毫無隱飾的擺在面上，待學生們如此，對教習們也

如此。當時，學堂裏有位教英語的教習顧祖仁，不知道是國外某國地方的華僑僑生，年紀只二十多歲，長於西洋音樂，大概回國不久，除流利的英語外，說不上幾句國語，至於中國文字，自然更屬有限。這與另一位英語教習比起來，那自然有天淵之別了。所謂另一位英語教習者，楊庶堪（滄白）是也。楊先生是巴縣秀才，中文成了家，而英文哩，據說是無師自通：文法很好，發音却有些古怪。（楊先生曾在丙班上大發牢騷說，甲班學生毀他連英文「水」字的音都發錯了。當時，不知道是我的聽覺不行嗎？如是我聞楊先生唸了十幾遍「水」字的英文音，的確不見得怎麼對。）劉先生之與他，不但聲氣相投，而且在那時節，成都學界中加入同盟會敢於革命的，除了高等學堂少數學生外，（如張真如，蕭仲倫，和已故的祝紀懷，劉公度都是。）在成都的教習班子裏，恐有劉楊二先生了。因再加之同志關係，劉先生之對於楊先生，較之對於顧祖仁，那自然兩樣。所以若干次在甲乙班二個講堂之間的教習休息室中，我們常常看見楊先生含着一枝紙煙，吹得雲霧騰騰的在說話，劉先生則老是親切而誠懇的坐在對面，講這樣，講那樣，如其顧祖仁穿着一身筆挺的西服走來，劉先生只管同樣起身延坐，但是談起話來，口吻間却終於抹不了一種輕蔑的意思，老是問着：『你不怕冷嗎？』『你不感覺冷嗎？』這，絕不因爲劉先生守舊，瞧不起西裝，因爲楊先生不也穿的是一雙大英皮鞋嗎？只管中式棉褲而褲管還是用絲帶紮着的。我們心裏明白，劉先生只管在講革命，維新，畢竟他是下過科場，中過舉人，又長於中國史學。對於先天中就於中文沒有根柢而過分洋化了的人，總有點瞧不上眼。這是四十年前的風氣，雖進步的劉先生到底也不能免焉。

劉先生不許學生抽紙煙，（這倒是幾十年來中外一律的中學校的禁例，却也是許多中學生永遠要干犯的。）每每當衆說：『我聞着煙子就頭痛。』但我們在背後輒反唇相譏：『那只有楊滄白口裏吹出來的煙子，聞了才不頭痛。』本來，他兩位先生個兒都一樣的矮小，不說心性志趣如彼此的相投合，即以形體而論，也會感得一個半斤，一個恰恰八兩。因此，一個丙班的不免過於渾沌一點的學生王稽亞，有一夜在北齋寢室中偶然說到劉先生之不討厭楊先生吹出的煙子時，他才忽然提高了調門，忘乎其形的說了兩句怪話。妙在適爲劉先生巡查寢室在窗子外聽見了。我們整個北齋的學生，於是都如雷貫耳的，聽見劉先生獅子般的聲音在大吼：『王稽亞！……你胡說些啥？……明天出來，跟我跪在這裏！』

我們當時都震驚了。但是一直到明晚滅燈安睡，並無甚麼事件發生。王稽亞雖是慄慄了一整天，却沒有下過跪。其後我們把劉先生這一次的舉動一研究，方深深感到劉先生之爲通品。

其一，王稽亞原本是個渾小子。劉先生平日便曾與之開過玩笑。有一次，王稽亞爲了失落一枝鉛筆，去告訴監學，事爲劉先生所聞，不由大聲笑道：『連一枝鉛筆都守不住，你還要稽持亞洲？算了罷！』

其二，渾小子說渾話，任如何批評，只能判他個「小兒家口沒遮攔」。倘若真要存心毀謗，目無師長，甚至存一個此風不可長而嚴辦起來，照規矩講，何嘗不可，但是這不免官場化了，示威則可，而欲令學生心服，則未也。

其三，只管是沒遮攔的渾話，畢竟難聽；況又親自在窗外聽見。於時，尙未滅燈，寢室

外面，來往尙衆，如其假作不聞，悄然而逝，豈但師長的身份下不去，即巡視寢室的意義，又何在焉。

其四，像這樣的渾小子放口胡說，若不立刻予以糾正，則將來定還有不堪入耳之言。苟再包容，則爲姑息；若給予懲罰，那又近乎授刀使殺然後繩之以法了。

從這四點着想，我們乃大爲折服劉先生之處理，不惟坦白，抑且機敏。學生是信口開合，先生則虛聲恫嚇，結而不結，牛鼻繩始終牽在手裏。看似容易，但是沒有素修養的人，每每就會從這些不相干的小事上，弄成了不可收拾的大故。因此，我常以爲單是有才，或單是有德的先生們，爲經師或有餘，爲人師便嫌不足。這其間大有道理，從劉先生的小動作上看去，思過半矣。

據我上來所說，劉先生之於管教學生，好像動靜咸宜，無疵可舉，醇乎其醇的一位最理想的中學校長了。我敢於全稱肯定的說，是的。而且我還可以再來一個全稱否定說，自我身受中學教育以來，四十年間，爲我所目擊的中學校長中，能夠像劉志先生之爲人的確乎沒有。這樣說來，劉先生一定是超人了。其實又不然，劉先生仍然是尋常人中可能找得出的。他之對待學生，只不過公正，坦白，不存成見，同時又能通達人情而已。他的方法是，不擺師長的官架子，不在形式上要求學生的一切都適合於章程規則，更不打算囉囉唆唆的求全責備將學生造成一種鄉愿。但他也絕不怎樣過份的把學生當着親密的子弟，從而姑息之，利用之，以便強強勉勉灌輸一些甚麼主義，甚麼學說，而結爲將來以張聲勢的黨徒，或竟作爲爭取甚麼的工具。不，不，劉先生從沒有這樣着想過。他看學生，只不過是一種璞，而且每個

璞，各有其品德，各有其形式。他是手執琢具的工師，他要把每個璞琢之成器。但是，他理想中具儲的模型極豐富，有圭，有玦，有環，有瑚璉，有楮葉，甚至有棘端的猴。因此，他才能默默的運用其心技，度量材料，將就材料，而未致像許多拙匠，老是本着師傅授予的一套本領，不管材料的千形百狀，而模型只一個，只好拿着材料來遷就模型了。我們由古代的說法，劉先生之教育，只是因材施教四個大字。由現代的說法，他不過能適合於教育原則，尤其多懂得一些心理學而已。所以我說劉先生絕非超人也。

劉先生在差不多的兩年監督任內，還有三件比較大的事情，值得我們的紀念。

第一件，是把四川高等學堂附屬中學的招牌，改爲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

附屬與分設兩個名詞從表面上看，好像分別並不甚大。但是按之實際，則大大不然。附屬中學，好似高等學堂的預科，五年修業期滿，可以不再經考試，直接昇入高等學堂的正科一類或二類（即後來所稱的文本科理本科）。平時，中學的教習，由高等學堂的教習兼任，即不得已而必須爲中學專聘的教習，如每班的國文教習，英文教習等，也由高等學堂監督下聘，也由高等學堂開支。其他如中學的行政費用，學生食宿書籍等一切費用，也全由高等學堂的庶務辦理。中學監督，也由高等學堂監督在教習中聘兼，或者向學堂外另聘。雖然也名監督，其實等於後世各大學所設的預科或附中的主任。而且因爲經費不劃分，監督不能聘請教習和辭退教習，在實際上，還抵不住一個主任。劉先生本是高等學堂一個史學教習，由當時的高等學堂監督胡雨嵐聘兼任中學監督。在胡雨嵐未死時，因爲尊重劉先生之爲人，中學這方面的用人行政，自然由劉先生全權作主，即一般高等學堂那樣的同事，也能爲了胡雨

風敬信之故，而處處與劉先生以便利。但是中國的事情每每因人而變。及至高等學堂監督換了人後，雖然並不存心和劉先生爲難，倒也同樣的尊重，同樣的敬信。或許由於才能差了一點罷，於是一般勉強能與劉先生合作的高等學堂同事，尤其管銀錢和管庶務的，便漸漸有意無意的自行劃起界限來了。這中間一定還有許多文章，還有許多曲曲折折的花頭，只是劉先生自己不說，我們也不知道。不過在宣統二年夏劉先生病故北京，我們爲之開追悼會時，高等學堂好些學生送的輓聯，却曾透露過爲劉先生抱不平的話。可惜記性太差，只記得一隻上聯，是甚麼「世人皆欲殺，我知先生必先死。」連送輓聯的名字都忘了。

因爲如此，所以在宣統元年秋季運動會——距胡雨嵐之死大概一年罷——之後，劉先生才借了下文就要說的幾件事情，不知道勞了多少力，費過多少唇舌，才爭到了將附屬中學從高等學堂那面把經費和行政劃了一部份出來，成爲一種半獨立的中學，而改名爲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我們當時都很高興，並不以損失了直昇高等學堂正科的權益爲憾。

後來，我們感到不足的，就是分設中學的地址太窄小了，僅有四個講堂，十幾間自習室，甲乙兩班的寢室已很夠擠，所以才把丙丁兩班的寢室，擠到高等學堂的北齋。本身沒有操場，沒有圖書館，後來因爲修了一間階級式的理化大教室，連食堂都擠到前面過廳上了。因之，才僅僅辦了四班。彼時中學是五年制，不分高初中，而且春秋兩季開班。如其在徐子休開辦時有永久的計劃，那就應該劃出地段，準備分期建修十個講堂，和其餘足用的房舍。當時在石牛寺那一帶，荒地很多，購置劃撥，都不困難，何況左側的梓潼宮相當大，很可以利用。我們不知道最初的計劃如何，只是從來並無擴充的迹象，以致丁班之後，不能再招新

班；而且待到民國紀元時，甲乙兩班畢業後，高等學堂監督周紫庭竟獨行獨斷宣布分設學堂停辦，——此即由於當初只爭到半獨立，而後任監督都永祿又完全以周紫庭之屬員自待，不但還原了附屬性質，而且還進一步辦成功高等學堂的枝指。——而以紋銀八百兩的貼補費，將丙丁兩班移到成都府中學，合在新甲新乙兩班去畢業。——當光緒年間，開辦學堂，多以天干數定班次，於是甲乙丙丁戊己之下，庚班就不容開了。此緣「庚班」與「跟班」之聲同。跟班者，奴才也。大家覺得不雅聽，因從庚班起，改爲新甲新乙。其後，還是不方便，才改訂以數目字來排列。但是，我想，將來還是要改的。——因此，分設中學，便成絕響。但我相信，倘若劉先生不在改換名稱之後，急急離去，或者不在宣統二年病故，而能回任，分設中學說不定可能繼續辦下來的。不過，也難說。以劉先生的性情和爲人，又加以是老同盟會員之故，像從民國元年以來的世變，他那能應付。分設中學縱然形式的存留下來，其精神苟非甲乙丙丁四班時的原樣，那又何足貴焉，倒不如像現在這樣的「絕子絕孫」還可以令我們回憶得津津有味，這或者不是李家祥一人的私見罷？

第二件，可以說，就是促成第一件的直接原因之一。時爲清宣統元年秋季，成都全體學堂——也有外州府縣的學堂遠遠開來參加的，如自流井王氏私立的樹人中學，即是一例。——在南校場舉辦了一次運動大會。我們學堂排定的節目，有甲乙兩班的槍操。甲乙兩班槍操了一學期，所用的舊廢的徒具形式的九子槍，自然是高等學堂備有的。而高等學堂的學生，也有槍操節目。這一來，自然就與平日輪流使用不同，非設法再增添八九十枝真正的廢槍不可了。

我們是附屬的學堂，事務上平日既沒有分家，那嗎，槍之夠與不夠，自然是高等學堂辦事人的事情，也是他們的責任。大約事前，劉先生也的確向那邊辦事人提說過，或商量過的，因此，在運動會開幕的頭二天，劉先生才很生氣的告訴甲乙兩班學生說：『今天你們下了操後，就順便把槍帶回來，放在各人寢室裏。』

我們立刻就感覺這其間必有文章做了。果不其然，高等學堂的辦事人遂一而再再而三的前來要槍。起初還聲勢汹汹的怪甲乙兩班學生不該擅動公用器物，劉先生老是笑嘻嘻的回答道：『只怪你們辦事不力，爲甚麼不早預備，我的學生們聰明，會見機而作。……至於你們那面夠不夠，有不有，那是你們的事，我不管。』

後來，演變到高等學堂的百數十個學生，被一般不滿意劉先生的辦事人鼓動起來，集體的侵入到我們學堂的食堂上，非有了槍，不肯走。劉先生一面叫甲乙班學生將寢室門鎖了，各自走開，不要理會，一面便親自到高等學堂，找着那般辦事人，很不客氣的責備了一番。結果，還是高等學堂自己趕快去備不夠用的槍枝，而索槍的集團也靜靜的只坐了一會便散走。但是，到運動會舉行那天，專爲他們高等學堂學生備辦了午點，而我們沒有。這雖是無聊的報復，却顯然給了劉先生一個爭取改換招牌的藉口，而我們本無成見的學生也憤憤了。

第三件，這不僅是我們中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抑且是四川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再推廣點說，也是清朝末季四川政學衝突史上一件大事。如其我不嫌離題太遠，而將那一天的情形，以及事後官場所散佈的種種謠言，仔仔細細寫出一篇紀實東西來時，人們必不會相信這是三十八年前的陳跡，人們必會爽然於近兩年各地所有的軍學衝突，政學衝突，警學衝突的流血